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 18 ·

和而不同：比较哲学 与中西会通

安乐哲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8·

(汤用彤学术讲座之四)

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 中西会通

“Seeking Harmony not Samenes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East-west Understanding

〔美〕安乐哲 讲演 温海明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美)安乐哲著;温海明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8)

ISBN 7-301-05699-0

I. 和... I. ①安... ②温... II. ①哲学-研究-中国-古代②宗教-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15②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504 号

书 名: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

著作责任者:安乐哲 著 温海明 编

责任编辑:王立刚

标准书号:ISBN 7-301-05699-0/B·0230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9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185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编者前言

“汤用彤学术讲座”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为纪念汤用彤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所作的贡献设立的。该讲座自1997年开始设立，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担任主讲。每位主讲的演讲辞和他们的其他相关论文编辑成“论文集”，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由于他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又有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人类古代文明能持

“同情”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序

2001年,中国文化书院和北京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汤用彤学术讲座”和“蔡元培学术讲座”把以前分别请海内外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主讲教授改为合请一位教授。去年五月我们请了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作为“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的主讲教授,收在本论文集的《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和《儒家民主主义》就是安乐哲教授两次讲座的讲演全文。

1984年夏,马里兰大学罗思文(Henry Rosemont)教授主办“比较哲学与亚洲哲学国际讨论会”邀请我参加,会议是在夏威夷开的,这样我就认识了安乐哲教授。以后我还多次到过夏威夷,安乐哲也多次到过北京,这种时候,我们总有机会见面。特别有意义的是1989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六届东西哲学家会议”,安乐哲教授还安排我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我的讲演题目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内在性与超越性》。安乐哲教授是研究“比较哲学”的专家,他特别注重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而且他对中国哲学许多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点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前言中看到。我不敢说我也是研究“比较哲学”的,因为我西方哲学的基础较差,但我多年来特别注意百多年来中国哲学所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这样,我和安乐哲教授大概也可以说有着学术研究上的共同兴趣吧!

现在西方虽然还有不少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早在两百多年前黑格尔就提出中国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甚至东方)所有只是“意见”,“与意见相反对的是真理”,“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①西方的这个传统应该说是根深蒂固的,安乐哲在《我的比较哲学之路》中说到:“西方哲学拒绝将研究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西方人在翻译和解释上总是不能挖掘出、也不愿意承认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西方研究者还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巨大差异厌恶化、模糊化,……。”但是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出现了一批学者,对上述否定中国有哲学的看法表示了怀疑,正如安乐哲说:“我认为,西方人没有视中国为一个充满异族情调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这种欠缺恰恰是西方哲学的亏欠,因为他们没有尊重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距离。……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简化主义的危害,并找出一套策略来避免它,……并对西方文化居高临下的普适主义立场持坚决的怀疑态度。这就是比较哲学。”正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中外学者的努力,用“比较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不少西方学者看到在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国化的佛教思想等等之中有着独特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同样是试图表达“真理”的方式。

我一贯有这样的看法:不了解西方哲学就很难在中国哲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第18页和第97页,在第119页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学的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这不仅是西方哲学会教给我们分析概念、命题、理论体系的方法,也不仅是会使我们能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自觉地把“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我们研究的部门往往是“经”、“史”、“子”、“集”等等,“哲学”并没有从这些中间分离出来独立成一门学科。“哲学”(philosophy)一词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18—1905)将这一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说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虽然有丰富而独特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但“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从“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等等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包含在“经学”、“子学”等等之中,我们还没有自觉地把“哲学”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先后进入中国,于是中国学者才开始把“中国哲学”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发现原来中国有那么多具有十分鲜明特色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因此,在中国把“哲学”自觉地作为独立研究的对象大体上是在20世纪初。经过一个世纪中外学者的努力,中国哲学已经取得了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阿拉伯哲学等等同样的地位,而为广大学者所重视。在20世纪的最后两年,为了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我组织了十余位中国学者共同编写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共十四卷,约四百万字,还附有十四卷相关资料,今年

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想，我的这种研究也是一种“比较哲学”。如果说，安乐哲教授有他自己的“比较哲学之路”，其特点是了解中国哲学来“沟通”中西；而我的“比较哲学之路”，其特点则是了解西方哲学来弘扬中国哲学。这或者说，我们的路径不同，但同样都是以“比较哲学”为基础，这也许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汤一介

2002年2月24日

目 录

序.....	汤一介(1)
前言.....	(1)
差异比较与沟通理解	
——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倾向及障碍	(11)
中国式的超越和西方文化超越的神学论	(24)
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	(51)
礼与古典儒家的无神论宗教思想	(83)
汉哲学关联思维模式.....	(111)
中国的性别歧视观.....	(148)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	(184)
儒家民主主义.....	(205)
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	(223)
孙膑兵法概论.....	(231)
评《中国思想中的道家理论》.....	(270)
参考书目	(281)

前 言

清晨我推开面朝未名湖的窗户，看到师生们络绎往回，在谈笑声中享受着暮春佳时。在这本小书付梓之际，可以抽空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不禁感叹历经何等辗转，我才得以坐在这湖畔的窗前。

我研习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生涯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我的父亲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哥哥教英语文学，写作一直是我们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不更事的我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诗歌创作，并且为了实现与杰出同辈风云际会的梦想，只身离开温哥华温馨的家，前往南加州以人文教育著名的雷德兰斯大学学习。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且让我心怀感激的是我能够以交换学生的身份被送到香港进修。那是1966年夏季的一个傍晚，18岁的我孤身来到那个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标志、色彩和味道的世界。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当我从不起眼的内森路旅馆向窗外眺望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无法逆转的转折。

我在雷德兰斯大学时学习西方哲学，同时满腔热情地

投身诗歌创作，追求紧张刺激和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像多少世纪以来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我很快被苏格拉底的真诚感染，开始了回应他“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征程。与苏格拉底发现自我的呼唤正好相反，我在香港时开始接触儒家哲学并迅速沉醉于中国哲学以“修身”、“弘道”和最终“平天下”为主旨的思想艺术。在新亚书院的那个夏季，我有幸聆听了一些著名哲学家——尤其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教诲。当时中国刚刚走出饱经西方帝国主义蹂躏的漫漫长夜，唐先生和牟先生正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的忍耐精神。那年夏末，我转学至沙田的崇基书院，开始师从劳思光先生钻研《孟子》。劳先生献身哲学的热情征服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年轻心灵。

那时的香港还非常贫穷。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杂有石子的米饭和清可见底的菜汤简直是家常便饭。但是，年轻教授们的课程却令人振奋，班上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友谊持续了几十年。不久以后，香港发生了排外暴动，有好几次，我和几个同学由于吓得不敢上街，彻夜滞留在别人家里，但主人对我非常关照。如果说我从课堂上和书本中学到了一点中国哲学，那么我从与我生活迥异的人们身上学到的要多得多。他们彼此关爱的人情关系让我见证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生命力。

接下来的那个夏季，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年轻”人的我怀揣着刘殿爵先生翻译的《道德经》，从香港码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回到了加拿大。那时我已倾心钻研中国哲学了。

从在雷德兰斯时算起，我总共花了十三年才完成博士学位。为什么？因为那时整个西方世界找不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即使现在，西方大多数哲学系也根本不教中国哲学。作为专业学科的西方哲学至今仍旧坚持哲学不过是盎格鲁—欧洲大陆哲学而已，而这无非是想沿用地缘标准而非哲学尺度来说服自我及世界。这一尺度的潜台词是盎格鲁—欧洲系统以外的其他文化对追寻智慧没有兴趣。在香港学习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种观点是心胸狭隘和不足为道的。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我越来越致力于挑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顽固偏见。

为了能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我不得不完成汉语和哲学两个本科学位。读研究生时情形也类似。我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学业，并同时师从方东美先生问学。1972年我从台湾回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研究系而非哲学系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我在台大学习期间逐渐意识到世界哲学界令人心惊的状况。今天在高等教育领域仍旧是西方哲学或者说几乎就是欧洲哲学一统天下。无论在台北、东京、汉城、北京、德里，还是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或巴黎，这似乎都被视为当然。土生土长的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不但在国外为人忽视，即便在本国文化中也被严重边缘化了。威廉·詹姆士在吉福德讲座的开场白中坦言：“对我们美国人来说，聆听欧洲人的训导似乎已习以为常。”他的话大致没错，只是他并没有将亚洲人也算在欧洲哲学的当然听众之

内。自 1907 年至今，这种情形在近一个世纪里鲜有改变。

此后我又在日本的亚洲研究系学了两年中国哲学，而后转到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得以与哲学家一起研习中国哲学。也正是在伦敦大学，我得以有机会师从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刘殿爵先生。刘先生坚持主张阅读原始文献，这对我思考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刘先生始终对脱离哲学原始文献的浮泛的学术讨论心存反感。第一天上他课时，他就劈头问我：“《淮南子》你读过几遍？”当得知我未及要求时，他面带愠色地问道：“仅此而已吗？”在他的谆谆教导下，我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多年以后我们仍在暑期的几个月里一起蹲在他汗牛充栋的书房中钻研《淮南子》。从刘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我明白了怎样才不愧身为人师。

安格斯·葛瑞汉也使我受益匪浅，不论是我在伦敦大学期间，还是其后他受邀至夏威夷大学做访问教授时，我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那些年他沿着马塞尔·葛兰言的思路，潜心研究如何将“关联思维”作为中国哲学特质，这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启发。

完成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业后，在刘殿爵先生的推荐下，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教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是西方惟一授予中国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佛教哲学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博士学位的哲学系。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在西方哲学界独树一帜，该系的第一位系主任是陈荣捷先生。30 年代，他跟查尔斯·穆尔一道创建了这个综合性的哲学系。设立这个综合性哲学系的

基本想法是，具备西方哲学背景的学生学习非西方哲学比单纯学习非西方哲学的学生更有优势，因为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生能够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手段和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拓展中国哲学传统。这种训练的优势并不在于西方哲学有着中国传统所缺乏的而研究哲学所“必需”或“重要”的“严谨性”，而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更有利的观察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唐君毅、牟宗三和方东美三先生对此都深有感触。

虽然虚心学习对双方都有益，但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哲学的研究可以通过对非西方传统中不同语言和不同范畴体系的众多相似问题的思考而得到很大提高。举例来说，以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所倡导的过程哲学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中算得上较新的课题，但中国传统的“气”宇宙论早在《易经》中就包含了过程哲学的世界观。如果认真研究既已成熟的中国过程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对过程哲学的兴趣可能会大幅提升。其实所谓“非此即彼”的传统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东西方哲学应该尽快改变相互排斥的立场。

我到夏威夷大学后不久就开始了与郝大维的学术合作。我们前后共合著了六本学术专著。在持续二十多年的友好合作中，我们力图将汉学技巧和哲学方法融会贯通，并将其运用于对传统中国哲学的诠释性研究及哲学经典的新译中，当然这一努力还未臻于完美。

我们的合作源于我们的共识，即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方式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中国哲学的体系是由深

奥的“哲学”著作，诸如《论语》、《中庸》、《道德经》及《孙子兵法》等组成的，可惜这些文献的哲学性至今未曾得到西方应有的重视。在西方，这些著作最初是由传教士，近代则是由汉学家翻译并解释的。也就是说，迄今为止西方哲学家们只是偶尔附带着研究一点中国哲学文献。这样说并不是要攻击那些怀有良好初衷的传教士们，也不是认为植根于精湛汉学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及文化方面的敏锐感觉可以或缺。事实上，如果真有所反驳的话，那就是指向我们西方的职业哲学体系，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不应该继续故步自封，宣称哲学不过是盎格鲁—欧洲哲学体系的天下。

如果西方哲学将其他哲学传统排斥在外，那么它作为一门学科就没有尽到学术责任。哲学家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要识别和描绘人类经验的共同特征，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研究问题。而当我们在文化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场所之间进行转移时，这些界定出的共同特征就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哲学家有责任去识别和理解那些非同寻常的命题，诸如如何区分作为文化简化主义防范策略的文化和由种族中心主义导致的文化误读。由于中国哲学缺少对西方听众进行转述的哲学家，也就必然要付出被误读的代价。当西方人文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时，已经给这些文本无形地强加了许多西方式的假设，并且配以能够传达西方式理解的词汇表。这已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最初，中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

框架里。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

近年中国的考古发现使一些从未出土或早已失传的哲学文献版本重现于世，这使西方世界觉得有必要重新译读这些哲学典籍，同时也给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既有标准译本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迎接富有想像力的挑战，亦即如何将这些经典用其固有的词汇在其自身的世界观中加以定位和阐释。

我们在重新翻译哲学经典时，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说我们的译文是“自觉自明”的，绝不是说我们的规则已被广泛承认，也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字面的阐释。但是，我们认为坚持要求译文要完全忠实原文不仅是无知的，而且其自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偏见。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作为翻译的目标语言的英语自身附带着诠释性的重担，由于缺乏充分的背景介绍和术语表，中国典籍的哲学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被大打折扣。进一步说，由于缺乏自觉自明意识翻译者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伽德玛式的偏见，所以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所谓“客观的”辞典。但事实是，辞典自身就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可见这种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

正如每代人都会有选择地继承先哲们的思想，并以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塑先哲，每代人都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来